

● 现当代文学

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

方 长 安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方长安(1963-), 男, 湖北红安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摘 要] 甲午战争后, 中国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关注, 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翻译的许多日本新学书籍, 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文人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 使中日文学关系逆转成为可能; 许多游日人士和留日学生, 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由实学或革命而转向文学, 由文学而借鉴日本文学变革经验, 使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 即中国文学回过头来向昔日学生日本文学学习。中国文学主要看取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文学, 它们不仅仅是中西文学关系之中介, 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前 30 年的中国文学。

[关键词] 中国文学; 日本文学; 关系; 逆转; 发生

[中图分类号] I 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740-05

中日传统文学关系, 基本上是中国输出日本接受的单向式影响关系, 日本传统文学的生成、发展深受中国文学甘霖的滋润, 其肌体内流淌着中国文学的精血。然而, 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发生了逆转, 中国文学开始从昔日学生日本文学那里获取资源, 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 “从 1894—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 1937 年的芦沟桥事变开始以前这一段时期,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 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1] (第 67 页) 实氏此论虽然太绝对, 有失偏颇, 但他对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关系基本态势的言说却是准确的。

那么, 中日文学关系何以发生逆转呢? 怎样逆转的呢? 中国文学回过头来关注日本文学时, 看取的是日本哪一时期的文学?

这些看似简单实却极为复杂的问题, 与两国近代化语境、历史进程、相互关系密切相关。中日的近代化, 实际上是被近代化, 是在西方威胁、侵略下民族自救的痛苦回应。近代化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西化, 而中国在历史上与西方的关系较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远为密切, 日本在更多的时期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模仿欧式近代化的条件“比日本人方便得多”^[2] (第 7 页)。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①, 日本人在近代化事业上却捷足先登, 通过明治维新乘势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并于 1894—1895 年甲午之战一举击败清朝帝国。

1895 年, 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极为痛苦的一年, 被向来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打败, 其震动、尴尬与羞辱体验, 远较半个世纪以前鸦片战争败于英国强烈得多。这一年彻底地改写了中日关系史, 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老大帝国“始知国力远逊于日本, 但日本在数十年前固无赫赫之名于世界, 而竟一战胜我, 则明治维新有以致之。”^[3] (第 45 页) 羞辱之中一改过去对日本不屑一顾的态度^②, 开始关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经验, 希望以之为师。

1896 年, 康有为编成《日本变政记》, 次年出版《日本书目志》。后又作《日本明治变政考》, 并于 1898 年 2 月进呈光绪皇帝, 谏其效法日本变法。在他看来, “欧美新法和日本良规能迅速光照我神州大陆”^[4] (第 223 页)。同月, 光绪皇帝便“索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③, “命枢臣进日本国志, 继再索一部”^[5] (第 300 页)。光绪此举, 旨在经由《日本国志》熟悉了解日本国情, 特别是其变革历史, 以期获取维新变法的资源。朝野上下对日本态度的这种变化, 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

* 收稿日期: 2002-06-27

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师法日本的主要举措有二:

一是翻译日本新学书籍。日本新学大都来自西方,中国为何不径取西书,而要迂道日本?这一常识性问题,并非没有引起世纪之交危机感强烈、心态焦急的维新派的思考。梁启超曾认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6](第54页)1897年,他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特别强调了翻译日文著作的重要性。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他宣称:“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6](第58页)张之洞虽然在政治意见上与梁启超往往相左,但对于译介日本书籍的认识却极为一致。1898年,他在《劝学篇·广译》中力言翻译日文书籍之必要:“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译西书不如译东书。”^[7](第128页)同年,康有为亦指出:“(日本)其变法至今30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成日文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译成中文时)其费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8](第129页)。倡导变革的杨深秀在1898年的奏折中,同样指出了日文翻译之便:“臣曾细研日本变法,如彼邦已译就西方佳著。日文书写与我相同,仅若干文法与我相反,苟经数月研习,即可大致明了,故利于我译(西方著作)也。”^[8](第129页)由此可见,倡导翻译日文书籍,旨在“力省速效”,以解燃眉之急,这实乃危亡之际民族生存智慧的体现。

理论上的倡导导致了日文译著高潮的出现。梁启超曾说过:“壬寅、癸卯(1902—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之输入如火如荼矣。”^[9](第182页)有统计显示,从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间,由日文翻译的中文书籍仅有12册,且其间只有2册由中国人翻译;而1902至1904年间译自日语的著作就达321本,占全部译著533本的60.2%。1896至1921年间译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书及期刊连载的译著),每年平均63.86本^[9](第131页)。

当时那些日文译著大都为教育、法律、史志、地理等类书,文学作品极少,然而它们对于中国文学转而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①。它们使国人熟悉了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革史,意识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尔小邦”,而是一个近现代程度颇高的新国家,一个值得中国效法的国家。这种新的日本观,构成了中国人关注日本文学的前提条件。而其中的文学作品(虽为数不多),特别是大量的文学性极强的政论文,其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则使中国文学界对日本文学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再鄙视日本文学,从而使中日文学关系的逆转成为可能。

二是派遣留日学生。关于游学日本之故,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陈析得极为具体、清晰:“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7](第116—117页)他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情势凡俗”相近,论述了留日之便。经济上的节省对于国力衰微的晚清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张之洞所洞悉的,主要还是中日作为东亚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运,特别是近现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为东亚近现代化的典范,成功地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同现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结合起来了。具体言之,就是将专制性的国家主义与民主性的启蒙主义结合起来了。其经验对于因洋务运动失败而困惑不解的中国统治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使他们找到了如何在不动摇封建专制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以振兴民族的方式与途径。张的言述有理有据,不久即为朝野上下所接受。

于是,古老的中国掀起了为救国而游学日本的潮流,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将之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据实藤惠秀统计,中国学生留日始自1896年,人数为13;1897年9人;1898年18人;1899年207人;1900年不明;1901年280人;1902年约500人;1903年约1000人;1904年约1300人;1905年约8000人;1906年约8000人;1907年约7000人;1908年约4000人;1909年约4000人;1910年、1911年人数不明;1912年约1400人;1913年约2000人;1914年约5000人。到1937年,总数约9万人,再加上未统计出的1900年、1910年、1911年、1915年、1917年、1924—1926年8年内的人数;估计人数不少于11万^[2](第451页)。

贾植芳曾将留日人员分为四类:“一、是正经求学,学习各类政治军情工商科学,以求毕业后谋个正经职业。二、投着资本、或者没有资本,只是在日本经商赚钱的,如同现在许多来日本留学的人,名曰‘留学’,实为‘扒分’(打工)者。三、无心专业学习,借留学为名追求个人的欲望——说好的,是个性的追求;说坏的,专讲嫖经食谱。四、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志士,有爱国的,也有颓废的。(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遗老也亡命过日本,如王国维)。”^[10](第10页)在正经求学类中,专业多是政治、法律、军事、工商、教育及自然科学等,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言:“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文学几乎未作为专业进入留学生择专视野,真正文学科班出身的,只有钱玄同、冯

乃超、穆木天、田汉等极少数人。这表明,留学日本宗旨在于科学救国,并未想到在文学上取法日本。留美学生胡适初去美国时以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11](第1145页),这实乃当时朝野上下及留学生(包括留日学生)的普遍心态。

然而,当局乃至留日学生们自己也曾料到,许多留学生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文学,并由文学进而关注、借鉴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致使中日文学关系发生了逆转。上述四类人中,一、二类志在当官发财,难以亲近文学;而三、四类则不同,第三类人中的有志者由禁锢的中国来到异邦,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压迫,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个性得以自由生长,对于“仕途经济”,兴趣淡薄,不甘受枯燥乏味的政治、法律、自然科学等专业束缚,兴趣自然由实学而转向发抒精神自由的文学,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他们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其中不少是日本文学作品。而当时的日本文学,据美国学者恩斯特·沃尔夫所言,其“现代性的基本成分实际上仍然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他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义,并非狭隘的创作方法,而是指“反对语言和情节的种种传统程式,作品运用白话,‘象普通人说话一般;写的是现代的场景、现代的问题;这是一种描写事物、描写人的心理动机’的现实主义。而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就是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愿望,它是一种比较笼统的对小人物的苦难发出的怜悯和同情,它企求人类的各种问题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2](第215页)。日本文学中这种新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转向文学的留日学生的心灵相契合,吸引了他们渴慕新知的视线。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他们深味出,日本文学的这种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正是中国文学中所缺乏而应加以借鉴、学习的。它们不仅在留日学生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定程度地规约了他们对文学现代性的想象与理解,影响了他们的现代文学观的形成,而且经由他们,最终创化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血肉。第四类中,流亡到日本的许多革命者,远离实际革命的旋涡,又不可能真正忘却革命,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反思革命陷入低谷的原因,寻求更有效的革命武器。于是,他们将革命与宣传,宣传与文学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使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与文学的关系。如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反思戊戌变法何以失败时,洞悉出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大秘诀:“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⑤在《清议报全编》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中,他写道:“本编附有政治小说两大部,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二书皆为日本文界中独步之作,吾中国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三。”他由此深信政治小说能浸润国民脑质,与变法、新民呈互动关系,所以要新民就必须利用文学这一启蒙利器。

由实学或革命而转向文学,由文学而关注日本文学的启蒙、革命经验,例如鲁迅、周作人译介《现代日本小说集》,便是希望从日本现代小说那里,获取传统小说现代化的经验。而这种关注又必然改变他们向来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如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序》中称道:“日本的小说在20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13](第1页)太郎在《一夕话——谈日本文学》中深信“日本明治末叶直到今天,最发达的要算文艺”^[14](第3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中日文学关系真正逆转的心理前提与基础。正是有了这一前提,梁启超才大力倡导国人创作日本式政治小说;周作人才会在《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中倡言中国小说家应以日本为榜样,“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并呼吁“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15](第149-150页)。这种由实学或革命而走向日本文学,是第三、四类留学日本人员中转向文学者共同的经历,至此中日文学关系才真正开始了因中国近现代化滞后而激起的逆转。

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的上述背景、原因与途径,决定了中国文学取舍、接受日本文学的具体情形,即主要看取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以期获得文学新旧转型、现代性追寻的经验。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谢六逸所概述的:“欧美各国的文学思潮,给日本的文艺界以很强烈的印象。在明治时代初期的文学里,有寝馈英国的坪内逍遥博士,有对于德意志文学造诣很深的森鸥外博士诸人。又有崇拜法兰西思想的中江兆民,倾倒于俄国文学的长谷川二叶亭,内田鲁庵等,因为有这么些人物,日本文学遂有迅速的进步。此后自私淑佐拉(Zola)的小杉天外的写实主义、与欧洲大陆文学接近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自然主义始,以至目前的文坛的新运动,大抵皆以从欧洲文学得到的新印象为原动力。不单是小说,即如戏曲、新体诗等,也是受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与刺激而始发达的。现代文学的后半期,虽有大半是独创的发展,而前半期却大都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⑥由此可见,日本明治以后各流派文学的代表作家,都是师法欧美文学的,许多流派的发生发展是以欧美文学为原动力的,如果没有欧美文学的移植、浸润,就不可能有日本现代文学。

西方文学孕育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被移植到日本时,随着载体的变更,其内在关系、审美意蕴必然发生某种变异。因为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文学同化着引进主体的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主体固有的心理图式也同化着西方文学。这就是说,日本文学固有的传统和当下的欲望制约着日本文学择取西方文学的过程,决定着西方何种文学进入日本以及如何进入,尽管西方文学作为异质文学冲击,改变了日本既有的文学系统,但日本文学的

“前结构”也不断地同化着西方文学,使之日本化。在这种双向交流、同化过程中,日本文学得以改造、新生,换言之,完成了创造性转换,一种新质的日本文学得以诞生。如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在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它虽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在技巧上有相通的一面,但在精神深处却是日本化的,对自然的态度是日本传统式的“瞑目对自然”,追求自然本性。其特殊形式“私小说”,以自我主义为中心,张扬个性,主观性极强,深受日本古代日记文学传统影响。所以,日本自然主义不是西方自然主义的翻版,而是日本化的自然主义。不单是自然主义,日本近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大都是在西方文学思潮冲击下出现的,与西方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其根基却是日本文学传统——写实的真实(まこと)、浪漫的物哀(もののあはれ)、象征的空寂(わび)、幽玄和闲寂(さび)、风雅,等等。

由于流注着传统的血液,日本近现代文学成功地实现了日本化。对此,中国新文学先驱们有着深切的认识。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中开篇就驳斥了那种认为日本文化只是对“他者”的单纯“模仿”之说,指出日本的文化源自“创造的模拟”。他在称引英国人 Laurence Binyon 的名言“世界上民族,须得有极精微的创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这样造就”之后,写道:“所以从前虽受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未失其民族性;而“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虽表面上看是“模仿”西洋,但实质上是“创造的模拟”,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20世纪的新文学”^[15](第134-135页),也就是日本化的文学。胡适也极为推崇日本人的模仿能力,认为日本文学“有很大的创造”,而这创造来自创造性模仿^[16](第262-268页)。化名 T·F·C 生的作者在致胡适信中,指出“日本人善取欧美之长,以补己之短”^[17](第369页)。日本文学专家谢六逸则从世界文学角度审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认为其“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有独创的内容与形式,决不劣于欧美的作家”^⑥。他们深知,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便是在异域文学的滋养中发展的,这是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性,所以日本文学往往是由模仿走向创造的,日本文学特性的形成过程,常常是异域文学日本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仅是中国文学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桥梁、中介,忽略或盲视日本现代文学的独创性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对此,我们又应作何种理解呢?

从文学传播、接受途径看,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确实在中西文学交往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因为许多中译西方文学名著是通过日译本转译的,例如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许多西方作家、理论家乃至文学思潮是经由日本而走向中国的。然而,这些只是中日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如果眼光仅停留于此,认识就无法深入到中日文学关系的实质处。

1921年陈望道先生致友人的一段话,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他说“你说日本只是间接的西学,我从这句话竟怀疑你底学问了!你已经了解日本文明?你还是连日本话都不曾懂,如那般无聊的日本留学生呢?据我所知,日本自有特长,不在摹仿西欧。中国如需摹仿外国,日本当然也有可以摹仿的地方,不会下于西欧。这以日本留学生而自馁的心情,似乎太不自爱了!你难道已经中了那不懂日本情形而说大话的人底毒了么?愿你三思,勿自舍弃!”^[18](第572页),陈望道希望日本留学生应觉悟到日本现代文化不是间接的西方文化,日本“自有特长”,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我们进而推之,作为日本文化分支的现代日本文学,亦不是间接的西方文学,尽管它深受西方文学浸润,但仍是民族性文学。它不仅仅是中西文学之中介,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

注 释:

- ① 日本学者依田憇家归纳出6点原因。见《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15页。
- ② 美国学者任达认为:“直到1894至1895年开始觉醒前,中国公众意识的视野中,日本仍未存在。”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相关文献有:Carol T. Reynolds, “East Meets East: Chinese Views of Early Meiji Japan (ca. 1870—1894)”,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 ③ 《日本国志》是作者1877年任驻日参赞后,经深入研习,历时9年,于1887年完成的一部50余万字的史书。
- ④ 当时的译著所使用的基本词汇大都是日本的新词汇,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法律、封建、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政治、美术、抽象、现实、科学、观念、政府、资本、商业、数学、哲学、社会主义,等等。离开这些词汇,翻译以至新的言说,便变得极为困难。它们不单是为当时译介日本和西方作品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将现代思想一同引入到了中国,因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同时也是思想本体。从文学角度看,那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汇,为当时特别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方便,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语汇。所以那些译著从一开始就在为中日文学关系逆转做准备,或者说,在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之前,它们就从词汇的角度作用、影响于中国文学。
- ⑤ 梁启超:《文明普及之法》,初刊于1899年《清议报》第26册,无题目,《清议报全编》卷六署此题,《饮冰室合集》题为《传播文明三利器》。

- ⑥ 谢六逸著《日本文学》，商务印书馆以百科小丛书形式发行，分别为第 98 页、第 96 页，此版本年月不详。1927 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了《日本文学》，1929 年再版增订本。后来商务印书馆还将之列入“万有文库”，出版过一次。

[参 考 文 献]

- [1] 实藤惠秀. 日本和中国的文学交流[J]. 日本文学, 1984 (2).
- [2]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3]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化与社会文化[Z].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 [4] 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 自注第 9 卷[M].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1)[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7] 张之洞. 劝学篇[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8] 任达.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9] 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 [10] 贾植芳. 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A].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中国比较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专辑)[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 [11]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 [12] 美·恩斯特·沃尔夫. 西方对 30 年代中国散文的影响[A]. 张隆溪. 比较文学译文集[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 [13] 周作人. 现代日本小说集序[A]. 周作人. 现代日本小说集[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 [14] 太郎. 一夕话——谈日本文学[J].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1922, 10(10).
- [15] 周作人. 日本近 30 年小说之发达[A].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16] 胡适. 信心与反省[A]. 林伟民. 胡适思想小品[Z].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7] T·F·C 生. 日本人之文学兴趣[J]. 新青年, 1918, 4(15).
- [18] 陈望道. 日本留学生应有的觉悟[A]. 陈望道. 陈望道文集: 一[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责任编辑 何良昊)

Japanese Chinese Literatures Retalions: Reverse Turn

FANG Chang-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ANG Chang-an (1963-),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After 1895 warfare it was a political culture background of the reverse tu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China began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Japanese modernize experience. Japanese modernize books translated changed Chinese disdainful look to Japan, and made what China learn from Japan possible. Many Chinese students and reformist staying in Japan changed their faith from science or revolution to literature. They began to learn from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so the reverse tu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took place.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not only was the medium between the West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gave a great inference up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Japanese literature; relations; reverse turn; take place